

中國 文明起源 新探



蘇秉琦

1897

香港中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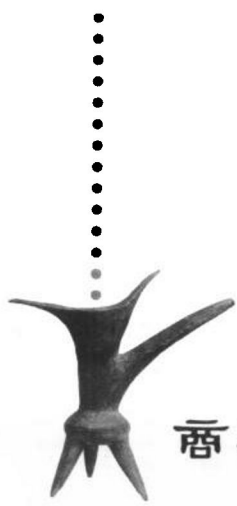
K87
S802



蘇秉琦

中國文明 起源新探

卷一 文化 史學



商務印書館 100
創於 1897

W467

提供圖片資料單位和人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中國歷史博物館、吉林大學考古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卍、薛玉堯、姜言忠、邵望平、劉晉祥、楊虎、高煒、朱非素、葉立中、陳國強、關子鴻、劉軍、牟永抗、王明達、石永士、田廣金、郭素新、郎樹德、趙殿增、段書安、李言、張肖嶼、李昭和、孫祖初、董新林。

繪 圖：史曉英 王 爽

出 版 人：陳萬雄

作 者：蘇秉琦

責任編輯：林春福

裝幀設計：蘇麗明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2次印刷

© 1997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20 1

Printed in Hong Kong

開頭的話

我從考古學上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起源是由彩陶和瓦鬲開始的，1941年我寫的《瓦鬲的研究》作為北平研究院第一本專刊，最初曾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付印。50多年過去了，1983年包括《瓦鬲的研究》和《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在內的《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4年獲首屆國家圖書獎，與此同時，遼寧大學出版社又將我從1984年以來10年間的文章和講話，以《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為書名出版。消息剛傳出，香港商務印書館立刻提出要在海外予以宣傳，近60年的交往因此又接續上了。商務印書館向以出版高質量的學術著作而聞名，從五四運動以來，出版過《大學叢書》、《外語文庫》等，這在當時各大學習慣於每年重複自印講義，不向社會公開，缺乏正常評論交流的沉悶風氣下，確是一個創舉。館方希望我這本書能反映考古學的一個新時代，又要雅俗共賞。要求雖然很高，卻符合我們學科的發展方向，也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於是就有了1996年初一個月的深圳之行，讓我對考古學科在探索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傳統起源過程中所走過的並不平凡的歷程進行一番回顧。



.....

—▲

●

兩個怪圈

.....



幾十年來，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

在中華大一統觀方面，我們習慣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於正史之外。於是，本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如夏、商、周、秦、漢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根棍串下來，成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少數民族與境外接壤的周邊地區的歷史則被幾筆帶過，這也使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若明若暗。

其實，講到中國歷史，從孔夫子起就不是把中國史看成是鐵皮一塊。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是三家來進行比較得出的結果，而不是看作一連串的三代。湯武伐桀不是繼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補，但還是周人的學問全面。“周禮”是國家大法，是周人建國治國的系統理論，以一個“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國家已成熟的表現，殷

人還未達到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為主。孔子又說“入夷則夷，入夏則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邊民族到中原來，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樣，中原民族到周圍地區，就被當地民族同化。這種同化過程往往是很快的，不過一、兩代人，而且進來是華，出去就是夷，進來出去又多有反復，所以，華夷之間的差別也並不是絕對的。孔夫子“有教無類”的名言，也是認識到他的弟子們來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傳統的背景來源不一樣，甚至差別很大，而且有不同種族之間的差別。“有教無類”的“類”一般都解釋為身份、背景，較少聯繫到種族問題，但殷墟的情況給了我們啟發。李濟分析殷墟大批人頭骨後，指出活動在商代中心地區人們的種族差別很大，他在《再論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一文中說：“從著名安陽遺址出土的人骨資料來看，就遠不是純一人種的。從研究這一人骨的頭形指數計算出的標準偏差數，遠遠超出正常範圍，這肯定地說明這一組

顛骨有着極不同的來源。”雖然時代越近，人種差別越小，但孔子時代，中原地區的人種差別仍然很大，所以，“有教無類”主要不是指社會貧富等級差別，而是種族特徵差別，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對種族歧視，這當然是很進步的思想。由於面對的是多文化且複雜的民族傳統社會，所以他講課的內容也是包羅萬象，兼容並舉。《周禮》所講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至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漢武帝以後的事，把孔孟的書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將朱熹一家定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後才形成的。

司馬遷寫《史記》也是兼容並舉的，他不僅對百家學說，分門別類介紹，不歧視那一派，比較客觀，而且修史內容超越國界，把西域的烏孫、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為傳，當國史來寫，實際上寫的是世界史。

至於另一個怪圈——社會發展史觀方面，我們習慣把馬克思提出

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歷史本身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把社會發展史當成唯一的、全部的歷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國歷史簡單化了。幾本有影響力的中國通史就有這種傾向：1958年前後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時編寫的通史陳列說明辭、北京大學師生合作編寫的考古學教材，都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產物。結果大量豐富的考古資料也只能“對號入座”，把一般的社會發展規律當成教條，再添加些考古資料便交差了事。連調查少數民族史也受到影響，一個現成的例子是，海南島的五指山，被說成是黎族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標誌。其實，五指是五支，代表黎族內部的五個各有特點的社會羣體，五支之間不是社會發展階段不一樣，而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標誌，是社會內部羣體分化，並不代表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把它簡單說成是所有制問題，只進行階級分析，那就把黎族的民族及其內部的特色給抹掉了。

其實，把社會發展史視為全部

歷史，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裏，並沒有找到甚麼理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概括社會發展規律的偉大工程時，是從研究具體史實開始的。恩格斯也並不認為人類社會從野蠻進入文明和國家產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條，他在寫《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時，就是在研究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能得到的史料之後，提出國家的產生至少有雅典、羅馬和德意志三種不同的國家形態，它們各有特點，通過不同的途徑，完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所制約的由野蠻向文明的過渡和國家的產生。

我們回頭來說近代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從二十世紀初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傳到中國，1929年中國最早的兩家考古研究機構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成立起，這個修國史的目標就很明確。如何修？傅斯年講過一句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意思是修國史要擺脫文獻史料的束縛，不拘泥於文獻，不是為了證史

補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實物史料，作為修國史的重要依據。考古學要從史學中獨立出來，自立門戶，這兩句話很像是考古學的“獨立宣言”。於是，設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剛成立，就直奔安陽，因為那裏發現過甲骨文，目的是研究商史；設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先在北平收集有關老北京建築的碑拓，又去了燕下都，後到陝西，卻不在西安附近挖周秦漢唐，而是打道寶雞，因為那裏出過一批青銅器，目的是研究先周先秦史，追溯周、秦的老根。

要以考古學修國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起源，說來簡單，做起來難，首先碰到那兩個怪圈就很容易鑽進去鑽不出來。如何繞過這兩個怪圈，道路是十分曲折和艱難的。王國維比較高明，他沒有被大一統承接的觀念套住，所以他講殷周制度論時，不僅講商朝史和周朝史，而且講兩種文化的歷史，所以能認識到商周不同源。傅斯年雖也提出過“夷夏東西說”，但已經有

了正統（夏）和非正統（夷）的觀念。徐炳昶有三集團說，不過還不是從分析考古資料入手。面對這種狀況，考古學要想獨立研究歷史，探索出中華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學科的方法論。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們學科的起點就高。建立考古學的方法這一問題，還得在下一章從中國文化的特別載體——瓦鬲和仰韶文化這兩個當時的熱門話題談起。



學讀
“天書”



“學 讀‘天書’”是1987年我寫《給年青人的話》一文中的一個小標題，說的是三、四十年代我硬着頭皮啃“天書”，尋找解釋“天書”密碼的那段經歷。

1934年，我在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院長李書華把我分配到考古組。9月，我隨所長徐炳昶（旭生）老師去陝西寶雞發掘鬥雞台遺址，第二年收工後，沿渭河調查回到西安，考古調查發掘使我有機會接觸到陝西關中西部古文化材料。此後一年多時間在西安着手整理我參加發掘的百來個小墓材料，準備寫發掘報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鬥雞台發掘停止，發掘材料於1939年初輾轉運抵昆明黑龍潭，繼續整理。要消化這批材料，對於像我這樣一位初學者，無疑是有困難的。沒有基礎，周圍沒有人可以請教討論，一切從零開始，只有蹲下來，邊摸瓦片邊思考。我意識到，從這批墓葬中的三種類型——直肢仰身豎穴、屈肢豎穴和洞室，以及

隨葬品中的三種器物——鬲、甗、灶這兩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或許能夠取得突破。為此，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數以百計的單位和數以千計的器物，它們都應該有它們本來歷史的、邏輯的順序，因此，必須使它們“各就各位”；第二，這批材料作為一批有組織的人們的羣體活動遺迹，在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史中應該有它們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必須從這部“天書”中尋找出它們原來傳遞信息的“密碼”，才有可能認識它們的真實含義。

面對這批“啞”材料，如痴如呆地摸呀摸，花費了多少個日日夜夜。這使我養成了一個習慣，看到陶片、陶器，每每摸來摸去，雖然也不一定有所收穫。朋友中流傳，說我好閉着眼睛摸陶片。我還聽說，有的同學真的閉着眼睛摸陶片，據說是從我學來的。這話三分是誇張，七分是誤解，隨便談談，博大家一笑罷了。對於陶器，如果以為僅憑視覺觀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體驗，那就錯了。科學是

以邏輯思維反映客觀世界，藝術是以形象思維反映客觀世界。根據我的實踐體驗，形像思維對於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絕不下於邏輯思維，而手感對於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印象所能代替的。

經過一段時期的實踐摸索，我終於好像從手下上百件瓦鬲標本找到解釋“天書”的密碼，識破這種中國文化特殊載體的基本運動規律了。

第一，按照發生學原則，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四種基本類型。這些類型按拼音字母A、B、C、D代表分別稱為：A型袋足鬲；B型聯襠鬲；C型折足鬲；D型矮足鬲（圖1）。

第二，描繪出它們各自的譜系圖，並按照它們的發展史，分為三大期——（一）原始鬲（斝），約當仰韶後與龍山期前，尚無可靠代表標本；（二）斝鬲A、B，約當龍山期至殷周之際；（三）鬲D，約當殷周之際至戰國。

第三，推測出它們從發生到衰亡的全過程。鬲的起源大致在彩陶

之後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間，消失在四、五世紀之間。整個過程大約相當於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段。

第四，產生了不同地區各有各的發展脈絡，商周不同源的想法。

當時的史學界稱中國古文化為“鼎鬲文化”，日本濱田耕作寫過《鼎與鬲》，認為鼎起源早於鬲。但鼎鬲源流不一樣，鼎是由圜底器加三足，鬲是由三袋足結合而成的，鼎鬲都是有中國特色的器物，但差異很大。尤其是鬲，世界各地都沒有見過類似器物，而在中國古文化中，它的存在又特別普遍而長久，是中華古文化的一種代表化石，對於追溯中華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與流變具有特別意義。鬥雞台瓦鬲的四種類型的劃分及其演變告訴我們，商王朝時期，周人已在西部興起，寶雞地區的瓦鬲已顯示出先周文化有兩個來源，一是自西北方向來的姬姓成分（CD型），一是關中土著的姜姓成分（BC過渡型）。周王朝時期，秦人已在隴西興起，東進至寶雞時帶來了素面袋

1 瓦高的分類

	A 袋足類	B 聯襠類	C 折足類	D 矮足類
半成品				
製成品				
縱剖面				
底面				
橫剖面				

足鬲（A2型）、屈肢葬和鐵器等文化因素，因此，從考古上證明，商、周、秦各有來源，在寶雞地區存在過商文化與先周文化的立體交叉，也存在過周文化與先秦文化的立體交叉。1983年當〈瓦鬲的研究〉收入我的第一本文集時，我在“補序”中又談到，經過四十多年新的工作與材料積累後，對這個課題的一些新認識：

第一，當時推測“原始鬲”的袋足應接近第一類型袋足的“缶”形器，現在看來，有的地方確有從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後裔底部構成新型的袋足罍類器，爾後再由它轉化為鬲形器的例子。更多的材料則說明鬲的原始型就是罍形袋足器。但同樣是從罍形器開始，經過袋足逐漸相互靠攏，再進一步發展為真正的鬲。而其發展過程卻分為兩路：一路成為有如第一類型呈銳角襠（或“隔”）的袋足鬲，一路成為有如第二類型呈高圓丘形襠部（或隔）的，曾稱之為“聯襠”的鬲。前一路呈銳角襠的袋足鬲又經逐漸降低襠部，最後形成鈍角襠

的，曾稱之為“矮足”的第四類型鬲；後一路呈高圓丘形襠部的第二類型，即所謂“聯襠”鬲，也是經過逐漸降低襠高，直到最後轉化為“折足”的第三類型鬲。前者似是曾活動於西遼河與海河水系地帶的人們（包括商人）所走過的道路；而後者則似是陝西關中地區為中心的居民（包括周人）曾走過的道路。我們或可更進一步推測：屬於前者的最後階段稱之為第四類型與屬於後者的最後階段定型的第三類型的，兩者的起點或轉折點的年代估計大致相似，約當中國編年史的夏商之際。

第二，在北方，活動於燕山南北，後來成為燕國範圍內鬲類的前期階段，同商人的遠祖似經歷過相似道路，到夏商之際才分道揚鑣。它的最後階段，即在北京附近所見的晚到戰國時期的“燕式鬲”。在南方，活動於江漢平原的人們（包括荆楚）走的則是不同於中原的道路，其鬲的形式始終沒有脫離鬲的原型（罍）的基本結構，僅在外部形態上發生過類似中原的階段性變

化。在東方，主要活動於山東一帶的黃河下游地區的人們，雖然使用多種袋足類器（鬶、盃、甗等），但真正使用的鬶類器，似非源於當地的老傳統。

第三，鬶消失的四、五世紀之間，正是孔孟時代。我在〈瓦鬶的研究〉一文中說到鬶的消亡時，曾引用了古文獻中兩段與此有關的故事：

1. “魯有儉者，瓦鬶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鏹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質》）

2.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孟子）曰：許子以釜甗爨，以鐵耜乎？……”（《孟子·滕文公》）

前一故事，似說明當孔子時代，至少在山東，瓦鬶還流行。後一故事則說明，孟子時代業已用

釜。對這兩段話和孔孟時代的區別還可以進一步引申。孔子欣然接受普通老百姓用瓦鬶裝的“薄膳”，弟子以為有失身份，孔子卻以此為榮，因為用的是鬶，不失禮，“如受太牢之饋”。孔子是很重視“鐘鳴鼎食”的，他在齊國聽到韶樂“三日不知肉味”。但當時已是社會大變動時期，工商業發展起來了，從西周末到春秋初起，社會分工有了新的轉折，候馬發現的銅帶鉤、銅鏡、連續小單元圖案的大銅器等，都是作為商品而大量生產的，生產的專業化、有重量單位（銖）的貨幣的出現與鬶向釜的演變是大致同步的。刀幣、布幣、圓錢三種鑄幣重量接近，都在12克左右，不同貨幣的流通，無大障礙。當時，“珠玉犬馬”是大買賣，在晉南、齊魯、邯鄲以及周王室所在的洛陽都出現了商人，新的階級起來了，他們過問政治，受人尊敬，地位很高。這種變革在孔子時代已出現，到孟子時代已很普遍，所以孔子周遊列國宣傳禮儀之邦不成功，不得已只好回到魯國講